

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所六十周年

清史论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编

(何龄修先生八十华诞纪念专集)

贰零壹肆年号

14 年
號

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所六十周年

清史論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編

(何龄修先生八十华诞纪念专集)

貳零壹肆年号

14
年
號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史论丛. 2014 年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清史研究室编.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043-6992-5

I. ①清… II. ①中… III. ①中国历史—清代—文集
IV. ①K249.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3894 号

清史论丛 (2014 年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编

责任编辑 刘川民

封面设计 丁琳

责任校对 张莲芳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ip.com.cn

电子信箱 crt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报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80(千)字

印 张 20.5

插 页 2(面)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6992-5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清史论丛》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戎笙
杨 珍
杨海英
李世愉
李华川
吴伯娅
陈祖武
张捷夫
林存阳
高 翔
郭松义
赫治清

主 编 李世愉
副主编 李华川
杨海英

目 录

进德修业，激励我志

- 写在龄修师八十华诞之际 张玉兴（1）

彰幽发潜学问自娱 提携后进甘之如饴

- 何龄修先生印象记略 任道斌（27）

- 记何龄修先生 孟彦弘（32）

《关于抗清复明斗争和郑成功研究问题的几点看法》一文读后

- 致何龄修先生的一封信 姚念慈（38）

- 明清文集里的“冠军” 杨海英（48）

- 清朝后妃母家的抬旗 杨 珍（61）

- 张苍水被执地舟山悬岙考辨 祝求是（80）

- 论清朝两京王府制的成因 李 理（100）

- 清雍乾时期休宁黄氏《家用收支账》相关问题考证 李 娜（111）

注目经史实学，裨益学术治道

- 张金吾为学藏书旨趣及其成就 林存阳（125）

- 金榜家世与著述考辨 徐道彬（165）

- 戴震《仪礼》学研究探析 邓声国（177）

清代云南边疆管理体制述略

- 以督抚体制为中心的考察 邹建达（187）

- 雍正朝对广西思明土府土目的治理 黄禾雨（196）

- 苏元春案与清末广西政局 李 晶（211）

- “李鸿章—福赛斯”新疆交涉档案研究 恽文捷（223）

清代科举考试的评价方法探究	冯建超 胡 平 (235)
樊守义与中西文化交流	吴伯娅 (242)
巴黎外方会之建立及其入华之努力	李华川 (257)
晚清时期中国和墨西哥建交历程	王士皓 (284)
曾国藩“先孝后忠”思想的另一侧面	
——以“咸丰七年丁忧事件”为考察中心	庄兴亮 (295)
晚清从族类观到民族观的演变	鱼宏亮 (309)

进德修业，激励我志

——写在龄修师八十华诞之际

张玉兴

欣逢尊敬的何龄修师八十华诞，谨表达我无限感戴之情，并敬上衷心的祝福：祝恩师精神矍铄，健康长寿！

我是很幸运的人。历经坎坷之后，获得了诸多师友的真诚关爱，引领我进入学术殿堂，并有所感悟而能贡献绵薄，这是我永远感念不忘的。在数位恩师中，与我时相往还，联系最勤，彼此以心相照，延续时间最久直至而今，对我倾注极多心血，对我影响、教诲与启迪最多的就是龄修师。在他身上我深深感受到矢志科研者终生无悔的不懈追求，及正直学人肝胆相照的真诚，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人世间的至真至淳的大爱，从而获得道德、学业的双丰收及奋勉不息的动力。谨于此际，请让我再次回顾与龄修师的交往过程，感悟他高尚的人品与学品，以表寸心并与同道分享。

一、谦和儒雅，热忱助人

龄修师之于我，是先闻其声而后见其人的。1979 年国庆节前，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进修时，偶遇一位热心友人告诉我，不可错过北京大学历史系，该系商鸿逵先生是明清史权威，德高望重，和蔼可亲，应挤出时间向他问学。我于是立即前往商宅，商老非常爽快地接纳了我，还同我进行了热情的交谈。商老说京师有两大清史研究重镇，即人民大学清史所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并一一介绍这两单位的专家及其学术特长。说他们都是少壮派，如日中天，实力雄厚。在介绍历史所清史室时，特别指出，何龄修功底深厚，很有学问，是文章高手。对其大加赞美。这是我第一次闻听龄修师之名。后来商老又多次谈及龄修师，说他耿直刚正，做事非常认真。说

他正经手编辑《清史论丛》，凡投稿者，都说他一丝不苟，抓住要点，受益匪浅。我油然而生敬慕之情，尽管我想这一定是位十分严肃的“望之俨然”、“听其言也厉”的难以接近者，但却滋生有朝一日能与之接触、受教的强烈愿望，以完善自我。后来，大概是1981年左右，一次偶然机会终于见到了龄修师，但完全出乎我的想象。他竟是穿着朴素，语调舒缓，谦谦儒雅，并无疾言厉色，绝不张扬，深感其平易近人，给我印象深刻。可惜属一般接触，而无由进一步沟通。

是《范文程归清考辨》一文，拉近了我同龄修师之间的距离。1983年年初我将写出的此文向《清史论丛》投稿，当时对能否接受发表毫无把握，特请同事好友我院历史所清史室主任杨余练兄代为打听，余练兄很快给我回音说，从何龄修老师处得知，论丛编委会认为文章不错，已决定采用，具体修订事项将由何老师同我直接联系。这让我喜出望外。此文得到了他的首肯，不久在通信中又得到他的细心把关。不仅篇章结构上提出中肯意见，遣词造句上亦悉心修润。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所指出的语言规范问题。原稿中有“是否是”字样，龄修师批道：“后一‘是’字多余，为什么要说多余的话？请在修辞上留意一下。”令我汗颜。自以为问题已经说清，其实语病甚多。这一针见血的批评，不啻当头棒喝，指出毛病，令我终生难忘。从此对修辞凛然为惧，尽管我文字基本工夫先天不足且修养不够，疵陋仍多，但从此著文时的炼词炼句不敢稍懈，也许避免了更多问题的发生。

而后，与龄修师的接触不断。1983年秋，龄修师莅临沈阳，参加全国第二次清史研讨会时，我非常荣幸地接待了他与数位清史专家陪同商老，到我家造访。当时我已结束三年的北京进修学习，商老面对我的几架藏书，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能多读书融会贯通是最大的快乐，从诗文小说中读出历史来，大家都有体会，可能何先生体会更多吧。这是商老当着龄修师面，指出其强项，赞美其博学多通。我想在学问探求上我得争取机会，好好向龄修师学习。

不久，我在室主任杨余练的率领下，接受龄修师与张捷夫先生共同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的撰写任务，同龄修师的联系更频，我从其身上学到的东西亦愈多。他对我以很有限的材料写成的《武理堪》与《阿敦》两文多所肯定，更让我自觉明晰展示人物性格与时代背景、生存环境的协调统一，浑然融为一体之重要性，而避免支离散乱。这时，对清代职官称谓开始注意，如我写的人物传稿中曾有称天命四年去世的武理堪为累官至前锋统领，称敦拜于崇德五年升任护军统领的记述，龄修师批示：还是依《八旗通志》所书官名为好。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因该书称前者为噶布什贤噶喇昂邦，称后者为巴牙喇纛章京。后来，龄修师曾向我提起邓广铭先生打开中国历史之门的“四把钥匙”说，而职官制度是其中一把，应准确掌握。此事让我念念不忘，反复琢磨，逐渐明晰了此问题，后来终于形成对清朝独特的典章制度，诸如八旗制及其特有的

官名、爵名等，必须严格辨明其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绝不能笼统，绝不能含混，必须严格区分，恰当把握的观点，实际即肇始于此。

龄修师对我的影响不止于此。大概 1983 年前后，我在李尚英兄陪同下，访问社科院历史所并顺访龄修师家。认门后又一再单独造访何宅。访龄修师家给我印象极深。当年何宅是历史所的一间十余平方米的办公室，位处二楼礼堂门口临楼梯处，是间举架很高，面积很小，窗户朝北的屋子，颇为局促。但几个特制的大书柜及藏书引起我极大的兴趣。龄修师告诉我说，这是居室兼书房。他风趣地说，我的书分为五库，即按古籍、理论、研究、工具及余兴五个部分收藏，故名五库斋，比四库还多了一库。又说工具库就是当年邓先生主张的“四把钥匙”说的钥匙库。我看到每个书柜皆有五六层，每层能放两排书。每层皆有该层放书明细，以便于查找。龄修师还向我展示分门别类收藏大量卡片的卡片箱。他说，从读大学时，就养成了读书记卡片的习惯，日积月累，所积渐多。这是我见到的个人收藏的最多卡片。此五库斋真可谓“屋小如舟而学问似海”！龄修师即是在这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精修学问的。我非常欣赏并信服荀子所说的“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的话，能与心仪的人相处是人生最幸运之事。龄修师谦逊平易，极好接近，而走进他的生活与学术世界，如入芝兰之室，令人心旷神怡。从此与龄修师的接触便日益频繁，彼此共同语言很多、很投机，谈起来滔滔不绝。道不孤，德为邻，龄修师的许多同事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也愿意同我接近，这是非常惬意之事。我只要出差进京，必与龄修师会晤。如 20 世纪 80 年代，我进京多住在崇文门的社科招待所，或建国门内大街社科院后身的四川驻京办，每次他多会前往看望我，畅谈所感。而生活上亦细心关照。有一年大概是 11 月初，突遇寒流，气温骤然下降，而招待所尚未供暖气，他与捷夫先生当晚即同来看望我，捷夫先生还特意带来一件棉大衣供我御寒，真是穿在身而暖在心，我切身体会到真诚友谊的可贵。

1984 年以后，是我研究清代东北流人问题及清开国时诸多疑案最为繁忙之时，一再外出访书，其中进京次数最多。得到龄修师的关照亦最多。当时最为紧迫的工作是搜寻记载清初东北流人诗文诸书，因极为分散难查，且多为孤本、善本，寻访颇为繁难。虽然我曾据在辽宁见到的《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征求意见稿）仔细记录所需，进京按图索骥，大有创获，且有新的发现。但操作中又感觉所记录不足，还须进一步查阅《善本书总目》，而身边没有。龄修师得知此情后，同我说不要着急，社科院历史所及文学所图书馆皆可找到，最后在他的帮助下，我在文学所蒋先生处顺利查到，解决了大问题。1985 年春，他得知我将赴广州访书，特意向中山大学张荣芳教授修书一封，请其协助在中大图书馆及中山图书馆查书。皆如愿以偿。这两年间，他对我的直接帮助最多，影响亦最大，他的同事、学生及追随者争起效尤，纷纷伸出援手，在学术上给我以助力。而龄修师不断为我提供学术、图书资料信息，经常亲自为我代买图书，如《张

家玉集》、《寒松堂集》、《独漉堂集》、《楚庭稗珠录》、《居易堂集》、《吴梅村年谱》、《戴名世年谱》，以及线装影印《皇明四朝成仁录》、《辽东三家诗》，还有《屈大均全集》、《钱澄之全集》等甚多图书，皆是龄修师代为购到。其中有些则是购后寄来，尤其是他居住在劲松西口901楼时，距邮局很远，他竟步行提书前往邮寄，我甚为不安，说既已购到，太好了。但不要邮寄，放在你处，不久我即进京可以取回。他常说，这些书你急需，还是先睹为快。就这样，他竟做起了我的信息咨询员及图书采购员、邮递员。在奋力拼搏中，我获得了巨大的支撑力量与温暖，感受到友谊的可贵。

二、学问切磋，道义相许

我与龄修师接触既多，经常切磋学问，彼此的契合点很多，探求奥义则更使我感到从来没有的惬意。我对龄修师论述柳敬亭之文的细腻、深刻颇感兴趣。他说他是从零篇断笺中发现端倪，寻求线索。读其《关于柳敬亭的生年及其他》，乃至《关于王紫稼》，极受启发，这皆是从野史杂书的字缝中发现问题，展示真相的。不广博读书，且博闻强记，深思熟虑，何能至此！这是治史的高超本领，令人折服。治史者读书不可不广博，不可不细致，不可不认真比对，反复琢磨，而发现问题做成学问。面对此，我想这不正是先师商老当年谆谆教导的读书要“眼而观，心而维”，“要看出问题来，想出问题来”的最为典范的成功实例吗？这对我的影响很深，后来我发表《关于陈梦雷第二次流放问题》及《郑芝龙史事补证二则》，龄修师阅后来信勉励说：令人信服，深得考证三昧。我就是在他的言传身教中，获得启示，得以长进的。

在与龄修师不断切磋学问中，我深感他读书认真，沉潜审思，能发现问题，推进学问。当年我对《柳如是别传》及《清初僧诤记》颇感兴趣，与其交谈。我结合自己搜集流人诗作，从中看到了广阔的历史场景，向他述说读《柳如是别传》加深以诗证史的心得体会。他说陈寅恪先生文史功底极为深厚，他阅读了大量明末诗词，博闻强记，对古典、今典皆融会贯通，了如指掌，考证笺释，挖掘深刻，详尽展示了复明运动的场景，这是很了不起的研究，给人们提供了许多思考的空间。他还曾对我说，《柳如是别传》是极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像你这样留意它的人并不多，最近广东要召开纪念陈寅恪国际学术讨论会，你不妨结合自己的治学写一篇体会文章，我推荐你带文与会。我说我对此书深感兴趣，却属于半懂不懂的人，把握不好，不敢写，私下慢慢领会吧。不久我见到龄修师写出三万余字的长文《〈柳如是别传〉读后》，深刻细腻，分析到位，他指出这是陈先生一生中最大的一部史著，给世人留下了史学著作的典范和奋斗的典范。他创造了学术史上的奇迹，这种精神将永垂后世，激励来者。该书的重点是深刻挖掘复

明运动，其要旨是表彰民族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我深感这是抓住了著作的精髓。龄修师说陈援庵《清初僧诤记》是借考证法门之争，颂扬气节，抨击降敌附逆的，观点犀利。他的另一部书《明季滇黔佛教考》袒露的思想更为直接，不妨一读。一读果然，弘扬民族大义凛然、做人本分的观点表述得淋漓尽致。正如陈寅恪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说“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由此可见史家非为治史而治史，皆有为而作者明矣。这里充分展示了史家的社会责任感，令我钦敬之至。龄修师的点拨令我豁然开朗，他对我的影响极为深刻，可谓全方位。从此，我便认定龄修师为师，尽管他并不认可，但我对他却心悦诚服，并深感这是终生之幸。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我逐渐明晰了理清史事与透彻解释历史内涵为研究方向，并以考证事实及明辨明清易代之际的忠贰问题为两大重点。这与龄修师不断地鼓励与大力支持分不开。他看过《皇太极留养张春史事考论》及《孙赤崖与赤岳和尚考》等论文，曾致信称赞说细腻周详，颇有功力。我很受鼓舞，感到如此研究路子正确，于是继续深入，并在读书中一再产生疑问，发现问题，一再思考，极力寻求解决之方，不断深入读书思考，反复琢磨。有时甚至把我困惑乃至设想，向龄修师倾诉。如 1985 年左右，我曾对李永芳长子李延庚的遭遇，产生浓厚兴趣，并收集一些资料，打了腹稿，向他汇报。他说这是目前为止尚无人注意的问题，值得研究，你应积极深入下去，把问题圆满解决。我于是更加在意未敢稍懈，但做起来却很吃力，颇费周折，对这个课题一直在思考诸多关联，一直在布局谋篇，却一直不惬意。这样竟反反复复思考了整整七年，至 1991 年，方成文并在天津国际明清史学术研讨会上提交《李延庚叛清考评》征求意见稿。在分组会上，龄修师与我同在一组，他听我发言后，极为称赞，说这是继范文程归清问题后，又一发人深省的力作。并说范文程归清一文是极有功力之作，堪称解放以后史学尖端论文之一，此文对清入关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探讨又进了一步。会后我又经一番琢磨，于 1992 年定稿发表。该年稍早，我因请教好友李兴盛先生，得知《不二歌集》所在，查到一读，遂对张春事进一步研究，发表了《张春及其〈不二歌〉》。于是我及时将两文先后寄奉龄修师请其指正。1993 年 2 月，龄修师赐函称：“《不二歌》一文很好。李兴盛兄风范亦可佩。同行相助，确能推动学术进步也。二兄为我们树立了典型。”一个月后（1993 年 3 月 14 日），又赐来长函说：

手示奉悉。

大作《李延庚叛清考评》定稿，较天津讨论会时又有进展，增加了有趣资料与分析，读之尤为得益。《张春及其〈不二歌〉》拜读后极佩服，前信匆匆，未遑略谈心得，实欲留待下信也。

鄙见以为，两文无论放在何处皆是优秀作品。

研究入关前降臣叛清问题，孟心史有开辟功。挖掘出爱塔其人，加以论列，揭露出明清关系中另一类历史现象，朝恢复历史的复杂面貌前进了一步。然孟心史仅拈得一例，仍可视为偶发事件也。大作继踵其后，挖掘出李延庚其人，并涉及他人，则证明此为集群现象，此其一；大作分析了叛清发生根源，揭露降臣在入关前之状况与心态，言孟心史、商鸿逵先生所未尝言，证明叛清现象有其一定的必然性。此二者均较心史先生《爱塔》一文是一飞跃，极可贵也。

张春事吴晗先生论《国榷》时提及，亦提及而已，此后似再无人研究，或浏览未遍，囿于见闻耶？然标举事略，表彰气节，系以时日，揭其情状，则大作开辟之功不可没矣！尤有进者，大作分析张春思想局限与思想光辉，语语中的，极有现实意义。历史为提高民族素质之科学，道德情操极可宝贵。大作于此点三复致意，足证作者社会责任感。附论三官庙与盛京皇宫关系，亦饶趣味。

自《范文程归清考辨》至李延庚、张春，可以见兄治学特色。兄不止于作《清代东北史》，研究大问题也，亦极乐于下苦功，扫除蛛丝尘封，寻觅（或发现）历史真迹。流人史如此，范、李、张亦如此，信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清理出如许事实，发未发之覆，拨云雾而见青天，虽不敢谓有同于汉庭老吏之断狱，亦一大快事也。此事甚难做，不止于勤奋已也，需心细如发，始能读书得宜，又需善于捕捉联系，剔除其虚假、谬误，加以提炼、概括，然后可以有发现。分析、论述则又进一步矣。此中甘苦，不历此境不能体味也。大作之成绩，可以见兄研究功力。

张春文提及李兴盛兄提示《不二歌》所在，因得以研究深入，撰成此文。大作说明此点，并深幸得助。李兄不吝帮助，兄不没朋友功劳，均值得学习。科学是群体事业，离不开互助。清史如许史料，穷毕生之力不能窥其一角。见闻未广，夫何足怪？如以此指为不扎实，真愚不可及矣。小文《关于柳敬亭的生年及其他》，有一注说明一关键材料系管劲丞先生最早引用，则小文系管先生启发始用明矣（《清史论丛》3，页265，注①），然管先生留一手，不注此材料出处，小文引此诗其出处则另下大力寻获者。然小文引此材料已后于人矣。注明此点，庸何伤乎？来教下询对此事看法，因并述及之。

另，李延庚又作英格，出《老档》，则后人（今人）误译也，似不足为据，未审高明以为如何？

匆匆奉覆，顺颂著安。

如此极力奖掖，浸透了他对我的深情厚谊，对我所写的文章他是下了气力认真阅

读，反复琢磨，并放在整体学术环境中加以衡量，表明了他的看法，足见他对我最为在意，在我身上他可谓倾注了满腔心血，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我深知这是对我寄予无限期望所致，我在无比感戴的同时，我更感到他在这里展示的是一种执著地追求与系念学术的崇高精神，而这是纯粹学人最为本质的精神所在。一个正直的学人，一个终生以学术为职志的学者，最为关心的莫过于所从事的事业的进展。他对清史研究情有独钟，对其来龙去脉，难点与热点，成就与问题，现状与前瞻，皆了如指掌。他不只是深深系念，而是竭力推进其发展与繁荣。从其赐函中，我强烈感到他对历史的社会功能与搞清历史真相的特别强调，这几乎成了他的一贯思想。在这两方面他对我关注最多，而这些也正是我用力最多之处。当我写出有关明末清初九义士及朝鲜三学士，乃至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褒善贬恶等文章时，他都及时来信予以鼓励，特别是有关表彰忠义与贬斥叛贰之事，他极为关注。

肯定明清之际反民族压迫斗争中的凛然大义大节之士，即颂扬忠义，发扬献身与担当精神，是我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史学认识。我在同龄修师交谈或来往信函中多次表明了这个意向。他鼓励说这很有意义，你应该写出来。这也正是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民族独立之精神。1998 年我著文（即《明清之际反民族压迫斗争中历史人物的褒善贬恶》）发表后，恰逢与龄修师一道参加在山西阳城举办的陈廷敬学术研讨会，会间休息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室主任高翔先生对我说，这篇文章观点明确，但总有言犹未尽之感，似应继续深入展开为好。龄修师得知后说，完全正确，他看到点子上了，你应该，其实也有能力把你的观点全部展示出来，因为这对弘扬民族精神大有裨益。在这种建议和启发下，我写成了《论历史上满洲与“贰臣”》及《明清易代之际忠贰现象探赜》两文，发表后有较好的社会反响。如前文被赞誉为“学者们普遍认为此文立论高远”（见《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 年第 6 期，第 88 页），后文亦被称为是“对明清易代之际的忠贰现象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正确评价”（见《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 年第 2 期，第 30 页）。而龄修师更对这类文章高度肯定：“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我们祖先用鲜血凝结起来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传统，维护了历史科学的纯洁性、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处处表现出历史主义科学精神、鲜明的是非观念，读后使人明确应该敬仰什么、鄙弃什么。”“这些犀利的论文，与流行的错误展开论辩，心平气和，说理透辟。”（见《清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第 113 页）

其实，后一文在写作过程中，龄修师为我倾注了心血，把好了学术关。我曾将七万余字的初稿数次寄给龄修师寓目，请其指疵纠谬，他都不厌其烦地细心审阅，有些地方他击节称叹，表示肯定，有些则提出具体修正意见，十分认真，甚至不正确的标点符号与错别字都予指出。我皆消化吸收，据以修润。其中有关中国昔日之版图与今日版图关系之表述，便是遵照龄修师的意见改定的。他曾特别强调，表述一定要合乎逻辑，要准

确严密，无懈可击，使观点理论立于不败之地。否则，稍有不慎，观点理论便出现瑕疵，甚至失去支撑，是很危险的。

1999年以后，龄修师一再鼓动我把历年以来发表的文章收集起来，出版一文集，并说我给你写序言，现在就写。但我却感到不成熟，文章数量有限，且深度、广度及力度皆不够，现在尚无必要，所以没有接受。他却一再说，你的文章数量颇具规模，足够了，深度、广度及力度皆达到可观的地步，其中不少是精品，结集出版将很有意义，很有必要。结合你谈的治学心得，二者相得益彰，可以互相印证，有教育意义。你放心，出版后定会产生好的影响。他所说的我的治学心得，是指我在1995年应所在单位的要求向年轻科研工作者介绍个人治学体会，后于1998年，又以答问式写出的那篇八千余字的访谈录：《严格自律与严谨治学》（载《科研成功之路》，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发表前，我曾将底稿寄给龄修师请其指正，他来信说：“访谈很实在，很好。所谈不独有益于青年，也定能启发同道。”2002年，我在同事好友武斌先生的鼓动催促下，方下决心准备出版文集。

最初，我并不准备请人写序言，因生怕有拉大旗作虎皮，自我包装之嫌。武斌先生说，一定要有序，我来写序，如已有人给你作序，我给你写一篇跋。盛情难却。这样我决定书前两序并存，于是才请龄修师写序，龄修师说，很好，我写。我曾数次有写序的冲动，你不让写，一晃三四年过去，现在只有重新整理思路了。很快，龄修师将写好的序寄来。随后武先生的序也一挥而就。他们的深情厚谊，让我感动不已。

但手持龄修师的序却让我着实犯难。我深感其中对我的过誉之词太多，公布出去会招惹麻烦，而“就清前史的发现、发明而论”，“在孟森、王鍾翰等前辈先生以后，至今罕有能与比肩者”的排他之词，等于把我放在火炉上烘烤，会让我孤立。担心让清史同行感到不快，我悚然为惧。我立即打电话请其加以修改，最好删掉这些过分之词。龄修师说这些措词皆经过深思熟虑，说的是客观事实，实事求是，无需过虑。如果这些评价不要，整篇序也就没了重心，那就弃之不用吧。我又写信说，序一定要，但我认为还是平实点好。如序中说明我在清史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成绩，我就心满意足了。因为这是实情。而我所获得的进步也是同您的指点鼓励分不开。龄修师回信说：“兄不是取得了一些成绩，而是取得了较大成绩。天文学家发现一颗新星就了不起，可以以己名命名新星。兄不止发现一颗新星，而是一批新星，不应看轻了。许多名学者无此成就，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苍天不负有心人，兄走的路正，劳动未白费。至于弟，对兄无任何帮助，从兄处则获益不浅。叨光知交，亦不多及。”龄修师旋又来信坚持说：“小序”之“评价自当以弟意为准，听候读者雌黄也”。至此，我只有遵从按原文付印了。

该《序》排版时，编辑将《序》中称我考证的“等等等等”之史事，及称我对清前史的探索是“很深很深”的表述，两个重复之词，皆改成单词：“等等”和“很

深”。我电话告之后，龄修师很不以为然，来信说：“小序‘很深很深’字样被编辑抹去，闻后久不能平静。此四字不是随意落笔，历数弘文所挖掘之史事，谁曾有丝毫前闻？范文程归清细节、李延庚叛清事实、龚正陆等人物及其史事，即认为由兄献与清前史而丰富之、补证之，不亦是乎？同吃此一碗饭，应知所比较矣。编辑先生以为兄名气不够大，不欲指出事实，甚可笑也。小集（按即《五库斋清史丛稿》）中收入此篇，存此四字（按实际存有八字即：‘等等等等’与‘很深很深’，见该书第175页），不然弟真成有眼无珠矣。”龄修师的执著与叫真令我感动。他绝不是从私心门户出发，而是对清史研究的走向有清楚的了解和把握，从清史全局、大处着眼，进行分析判断的。他诚心诚意地希望清史事业兴旺发达，见到一些堪称道之事，而由衷喜悦，便热情肯定，并竭力推动与鼓吹之。我看到了他有一颗虔诚纯真的事业之心。他希望大家都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地共同把所从事的事业搞好。然而实际往往并不遂人愿，遗憾甚至怪异之事太多，更令人有诸多无奈。

仅以编辑对待作者稿件处理之事为例，编辑的职责是遵循学术规范，并把好政治思想关、语言文字关、逻辑关，根据编辑体例与要求加以处理稿件。至于篇章内容，布局结构，乃至遣词造句、语言风格，只要没有谬误，应一仍其旧，完全没有必要挥动编辑的刀斧，因为这是作者的文章，不是编辑的文章。随便改动是对作者的不尊重。而且自以为是的修改往往改错，甚至改得畸形离奇，惨不忍睹。此种令人不快的例证不胜枚举。龄修师曾告诉我说，王锺翰先生为一辞书撰写介绍《清史稿》的词条，原稿是“赵尔巽主编”，到编辑手里竟改成“清末赵尔巽主编”出版。下面落款是王锺翰。王先生看过很是恼火：“民国时的书，怎么成了清末？常识都错了，乱弹琴。”又对我说：“我写悼念福建一位老先生的文章寄去，在该地的一份报上发表，文中‘后死的我’，发表时竟被改成‘健在的我’，自谦变成了自傲，分明是对逝者的大不敬。我做编辑工作，尽量掌握分寸，尊重作者原意，需修改处除与作者协商，防止谬误外，绝不随意改动。因为文责自负，如给改错了，作者能负责吗？”龄修师是这么说的，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这种既认真负责又尊重作者的编辑风格也是《清史论丛》的一贯作风，历届主持编辑工作者皆如此。

三、竭诚关爱，恩惠无尽

2004年，我投标参与国家清史修纂工程得中，成为传记类顺治朝康熙朝卷的项目主持人，邀约同道共同承担撰写任务，得到了龄修师的竭诚帮助。且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关心、关照，学术把关及锤炼提高，助我多矣，这是深挚的友情，这是无尽的恩惠！更

让我感受到龄修师光明磊落的恢弘气度及高尚的精神境界。而这一行动的本身就堪称做人的楷模，有极深的教育意义。

国家修纂清史是21世纪初文化学术界的一件大事，牵动了千万学人之心，曾引发热烈讨论。本来，龄修师不同意这一举动，不论大小会上，他都表明了这一态度。我们之间也不止一次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彼此交换了看法，当然彼此并未说服对方。2002年年底，清史工程由国家立项后，我又一再动员龄修师参与此工程，为其贡献力量。我说，过去对这个工程应不应该启动，大家都表明了不同的看法，完全正常。现在它已是国家工程，成果将以国家名义出版，其成败当然代表国家学术水平，而爱国是你终生无悔的选择，所以你不能对它旁观。龄修师说，你这是步步紧逼。我说不敢，因为我认为这个工程太重要了，需要方方面面的力量支撑，它不能没有你的智慧，我衷心希望你能发挥作用，我的态度仅表达一个普通清史工作者的赤诚之心。龄修师说，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不要强求一律。但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我多次与龄修师通信或谈话论及清史纂修问题，仍是请其出山。2003年3月6日，他给我来函称：“接奉大教，蒙兄殷殷关注，仍以参加清史纂修相劝，至为感谢。但弟以为我兄此函高估弟之能力，弟毕业四十五年矣，所做工作失误频频，《揖芬集》（按即《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所刊小文可见一斑，其不能有益于人如兄所期待者是可知矣。况弟健康状况不佳，不能放弃养身延年宗旨，非敢自私，实非得已。”仍是拒绝我的恳请。尽管如此，他还是面对现实，关注已经启动的新清史纂修。不久，他又来信针对我《评〈清史稿校注〉》一文，抒发感慨地说，如有清史功力深厚，学殖丰盛者参与清史工程，并发挥重要作用，则新清史“庶几有望成功”。我强烈感到他还是希望新清史能够修纂好。不久龄修师将其刊登在《中国史研究》上的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之文见赠，对其深厚的学识与功力我无比钦佩，我愈发深感新修清史绝不能少龄修师的智慧。于是，在一次会议上与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老师会面时，我向他介绍这篇文章，并诚恳表达新清史应请龄修师加盟的愿望。因不便直接说应该由戴老师亲自敦请，我随后与参会的王思治老师说明了我的想法，思治老师说：“我同意你的主张，这是好事，很有必要，我可以同老戴直接说。”这年年底我到京时拜访龄修师，他说戴老师不久前托王俊义老师捎来一函，用文言写的，邀请我参加清史纂修，但我回绝了，理由是身体不做主，实无其力。我深表惋惜。他说你不要这么看，是实情。于是他拿出复函的底稿来，其上写道：

戴逸先生史席：接奉手教，至为意外。龄忝厕清史研究行列，老大无成，其驽钝陋劣可知也。大示奖掖过当，读后深感惶悚。承委要务，给以稍效犬马兼济困穷之路，自当趋奉，以副厚期。惟自上世纪末数年来，贱躯衰病，始自

手臂震颤，继以视听锐减，去冬今春且增昏晕呕吐之症，停止读写，日事颈项锻炼，此症得以缓解，至今不敢懈怠，始终坚持，而重疾则无所改善也。故数年前即辞谢赫治清、高翔两君邀约，不敢参加其分别主持之项目，亦拒绝友人敦促作老年基金项目申请，自知精力不胜，不欲枉费国家科研资金，贻误任务完成也。目下仅选作不称学术之小题，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且断且续，可成则成，无人督责，心安理得，他非所望矣。已将下情面陈王俊义先生，烦其转达不堪驱使，惧伤明察之意。今特专函奉复，诚请见谅，并表感谢。恭祝康泰。

何龄修 上 2003 年 11 月 5 日

于是，我要求看一下戴老师的来函，确实其文辞典雅，情深意挚，热情邀约，十分得体。我说，二文都是范文，很感人。龄修师说，他文言功底很深，写得很好，我写不了文言。他的态度明确，但我身体实在不行，不能耽误大事，不能允命。对此我尽管很遗憾，但对戴、何二位老师的以心相照的书信往来，却很宽慰。我对龄修师说，但你绝不要做局外人，应想方设法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还应对新修大清史贡献力量为好。

我是满腔热忱准备参与清史工程的。2004 年 6 月 29 日，清史编委会将一些项目向国内外公开招标，我见报立即投标，投标项目为“传记类·顺治朝康熙朝卷”。年底中标。但我深感从事它并非易事，须付出极大的辛劳，并有坚实的学问作保证。虽殚精竭虑，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亦难免不出疵陋，甚至出现严重问题，亦未可知。尽管兴高采烈地投标，但又临事而惧起来。可是说心里话，我虽惶恐确也有底。一是有多年的学术积累，自己的半斤八两还是心里有数的，二是我身边有位多年来对我极为关注的学问大家龄修师，他绝不会看我笑话，他会帮我。而且，从我设想参与清史工程时就盘算：必须请龄修师帮助。而在我与龄修师谈论清史工程，表明我要参与时就曾表达过这个态度，但他不置可否。此刻，既已获得参与，为避免差错，弥补我的欠缺，防止疏漏，亟须助力。所谓“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我再一次明确向龄修师请求。我说，我太需要你的支持，你的纠谬补阙、把关指导。而且因为多年来，我的学问能有所长进，我的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浸透了你心血。我的每一项研究你都关注，都希望成功，现在所接受的任务，非比往常，你当然不希望我坏事。所以不论你对清史整体工程看法如何，我既已接受了这个项目，你必须支持，同意得支持，不同意也得支持。我写的你必须过目，看一看就行。龄修师说，我精力不济，看不了。我说，有没有精力，也得看。我是赖上了。龄修师说，逼人太甚！那容后再说吧。其实，龄修师支持了我，答应了我的请求。不久他对我说，我不参与清史工程，但却被你们卷了进去。有三个人的忙我必须帮，就是你，还有二王：王戎笙及王思治，都是我的老朋友，盛情难却，我允诺了，你们三人为清史工程写的东西我会看的。帮一点力所能及的忙吧。我说，这好比当年黄宗羲之于